

力空法师救护《赵城金藏》问题考实

李 凭

笔者在上一期《文献》杂志发表了题为《救护〈赵城金藏〉的策划者力空法师行略——以〈霍山志〉和力空法师自撰的年谱为题》的文章，介绍了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的力空法师自撰的年谱——《念死法师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该稿草成不久曾就教于林世田学友，蒙示以扈石祥《八路军救护〈赵城金藏〉纪实》（刊于《佛教文化》1993年第1期，以下简称《纪实》）一文，甚为感谢。扈石祥先生的文章对《赵城金藏》被救护的过程有详细的描述，很有价值。然而，与《年谱》仔细核对，发现它们互有歧误不足之处，因而略作考证。先将《纪实》中有关力空法师参与救护《赵城金藏》的内容概略地抄录如下：

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入雁北，蒋介石派遣第十四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住在赵城张奇玉宅，李默庵告张奇玉派人将广胜寺住持和尚力空法师唤到赵城县城商议转移藏经之事。当时张奇玉见力空和尚后说：“军长已扣下火车皮了。”力空法师表示：“《金藏》属于赵城全县所有，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不能作主。”于是张奇玉出面召集县内有关人士，在他家集议。……众人说：“重庆能保住必不失吗？”李默庵回答不出。众人说：“既然无人敢负责任保住重庆不失，则我们广胜寺的藏经，费上九牛二虎之力，转移到重庆还是难保，与其失之重庆，不如失于广胜原地。”至

此李议即作罢论。次日，力空法师返回广胜寺，即将《赵城金藏》五千卷封于广胜寺飞虹塔内。

1938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八日），阎锡山又派人自临汾来到广胜寺，与住持和尚力空法师商议，要把《赵城金藏》往山西吉县山内转移。力空法师说：“你们来的太迟了，藏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既不易，更难保证安全。”来人无奈，始下山而去。

1938年2月26日，日军占领赵城，27日进占洪洞，广胜寺已处于日军占领区内，距日军道觉村据点仅1公里，1940——1941年期间，日本人多次询问过供养在广胜寺的《赵城金藏》。……

1942年春，驻道觉村的日军向寺上提出要在旧历三月十八日（1942年5月2日）传统的庙会期间上飞虹塔游览。当时佛经就藏于塔内，如打开塔门，日军发现经卷，必然抢走。力空法师深知《赵城金藏》之珍贵，于是，立即到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县长杨泽生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杨县长听了这一消息，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李溪林、副书记吴辰同志作了汇报，并通过二区区委书记杨伯庆、石门峪教员杨百顺二同志与力空法师协商抢救办法。在协商过程中，力空法师思想矛盾，顾虑重重。他知道《金藏》仍放在塔内，就要被日军抢走；但交给了抗日政府，当时日军扫荡频繁，也难免丢失。法师从爱护经卷出发，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扫荡时丢失。这些条件杨县长答应尽力做到后，密商决定：必须在旧历三月十八日以前将《金藏》抢运转移。在协商过程中，李溪林同志根据力空法师的要求，派县城工部长傅青菱同志（该同志后任赵城县第三高校副校长）跑到敌占区赵城城内，和绅士们联系接

头，打通了思想，取得了同意，从而使力空法师下定了将《金藏》全部交给八路军的决心。

1942年4月，延安批发了救抢《赵城金藏》的报告。

李溪林接通知后即和徐生芳同志（注：当时任赵城县抗日政府游击大队大队长，抢救《赵城金藏》时任现场行动总指挥）奔赴广胜寺，寺离县委机关驻地吴儿峪约10公里，于傍晚时分到达，随即和广胜寺住持力空法师商谈抢运经卷之事。商谈中，力空又谈出他对《金藏》存放在游击区难免丢失的担心，要求速运延安，亲手交给朱总司令。李溪林、徐生芳二同志在和力空交谈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宣讲了党的宗教政策，表示了我党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通过交谈，力空法师更坚定了把《金藏》交给八路军的决心。

经过严密部署，确定于1942年4月27日（壬午年三月十日）行动。在八路军、地方抗日武装和广胜寺三十多名僧众的通力协作下，28日午夜零时许全部经卷安全运出广胜寺。

为了力空法师及广胜寺僧人的安全，县长杨泽生同志给力空法师开了借据，借条上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及县长的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推卸众僧责任。

《金藏》由广胜寺运走后，力空法师为了逃避日本侵略军的抓捕，于6月20日（壬午年五月七日）移住广胜上寺后殿东侧吕祖洞躲藏。不出力空所料，日军闻讯后，即率部到广胜寺向力空法师问罪，没有抓到力空，即将寺里的二十多名僧人捆绑走。力空在黑暗潮湿的吕祖洞躲藏了三个月，于1942年9月27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到兴唐寺任住持和尚。山西省日伪省长苏象乾（体仁）为《金藏》事还亲自到赵城调查过，力空法师据理力争，义正严词，抗议日军暴行。他爱国爱教的壮举，在我国现代佛教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与《纪实》一文相对应的，在《年谱》中有如下的文字：
《年谱》四十七岁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条载：

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秋后，日军至太原。抗日军退至晋南。贾韬园乘检阅绥靖主任行营之便，偕采运处处长蔺芳生来山游访，留有诗言。

《年谱》四十八岁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条载：

正月底，日军南犯到洪洞。三月初三日（4月3日）日军第一次到霍山，声势很凶。……自夏徂秋，日军向广胜塔打大炮弹者七八次，惊慌恐怖，时刻不免。

《年谱》四十九岁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条载：

本年日军上山滋扰者八九次，大炮弹落于房上院中者七颗，然仅打毁砖瓦数块而已。

《年谱》五十岁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条载：

冬月，日军集中大多军力在太岳区扫荡，广胜幸获安全。

《年谱》五十二岁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条载：

冬月，日寇大行扫荡太岳区，凶势来山者前后计五次，幸蒙佛菩萨默佑，未遭残祸。

《年谱》五十四岁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条载：

广胜寺藏有金时刊印的捲式大藏经五千多卷，世人均认为是无价的法宝，为免日寇强迫索要，我与杨县长密商，速运后方。因派大部同志，于三月十三日夜由寺起运，送往延安保存。五月初七日我移住吕祖洞，掩关修法（四无量观）一百天，于八月十八日出关。时兴唐派来接我的人已等候几天了。因为七月二十七日日军刺杀兴唐寺僧俗共十一人。事后，人多惊走，监院僧值等请我去行维持，不得已，我偕往兴唐，居住半月。

《纪实》和《年谱》都是珍贵的反映《赵城金藏》被抢救的

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资料，从这两份资料中我们都不难看出力空在抢救《赵城金藏》的活动中的重大作用。但是，仔细对比这两份资料，就会发现它们都有歧误不足之处。

首先，抢救《赵城金藏》的年份，二文所载不同，《纪实》作1942年，《年谱》作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按惯例，应以力空自撰的《年谱》为准，不应以半个世纪以后发表的《纪实》为准。但是，华北版《新华日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六日刊登了抢救《赵城金藏》的消息，标题为《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现将原文抄录于下（《纪实》也引录了这则消息，但有五处文字抄错。另外，《纪实》称《人民日报》于1949年5月21日头版登载了《名经四千卷运抵平市》的消息，但核该年《人民日报》5月21日〔阴历四月二十四日〕和6月17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报纸，均不载此事，可能是报刊名或日期有误）：

新华社太岳分社讯：据确息，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四千七百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且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并得该寺和尚之协助，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

《新华日报》不可能预言两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因而可以断定《年谱》将此事系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是错误的，抢救《赵城金藏》年代应以《纪实》和华北版《新华日报》为准。真是，书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自撰的年谱尚且难免有误，况于他书乎！我猜测，《年谱》发生错误的原因，或者因成稿仓促，或者因印刷时排错。在《年谱》的引言中称，力空写《年谱》仅用了“两天礼念的时间”，而力空在《念死文汇目录》之后签署的时间是丁亥冬月初八日，即1947年12月19日，则力空是在18日

和19日两天之内写成《年谱》的。即或以力空决定绝命于冬月初三日（12月14日）封门礼念作为打腹稿的时间起计算，撰稿时间也不超过6天。以短暂的6天去回忆、记录一生的事迹，错误在所难免。然而，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对难以确切记住的月日力空并未记错，何以对不易搞错的年代却弄错了呢？《年谱》的成稿时间虽然很短，但在《念死文汇目录》中登记了约有四部笔记或随笔，这些构筑《年谱》的基本材料是经日积月累而成的，在年代上不应有误。况且，事实上《年谱》成稿之后力空并未绝命，在以后的生活中只要偶或检阅《年谱》，就能发现年代误系的大错。由此看来，力空自己搞错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应该注意到，《年谱》是在力空离开安康前后付梓的，因而我们难以确定他是否亲自看过校样。人去楼空，一旦排印错误，未能检校出来，也是难免的。

其次，二文的抢救《赵城金藏》及其前后事件的日期不尽相同。现列表对照如下：

文 稿 事 件	《年 谱》	《纪 实》
抢救《赵城金藏》时间	阴历三月十三日	阴历三日十日~三月十一日 (阳历4月27日~4月28日)
力空移住吕祖洞时间	阴历五月七日	阴历五月七日(阳历6月20日)
力空出吕祖洞时间 (往兴唐寺时间)	阴历八月十八日	阴历八月十八日(阳历9月27日)

对照上表，我们发现下面的两项时间是一致的，说明力空的记忆相当准确。但是上面的第一项，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却不一致！在《年谱》中只列了阴历的日期，而在《纪实》中阴历与阳历是都写清了的。我们不知道《纪实》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中的日期用的是阴历还是阳历，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上面。1942年4月27日

的阴历日期不是三月十日，而是三月十三日；而壬午年三月十日的阳历日期不是4月27日，而是4月24日。4月27日（三月十三日）还是4月24日（三月十日），二者只能居其一。现以《年谱》所载日期佐证，应该是4月27日（三月十三日）。我以为，民国时期乡间习惯使用阴历，《纪实》所依据的原始资料 按例也使用阴历，4月27日这一阳历日期是后人或《纪实》作者换算得来的，倘若计算中不发生错误，那么换算回去，原始资料中的阴历日期应该与《年谱》一致，为三月十三日。但是，几经传抄或排印，不慎丢了一个“三”字，于是“十三日”变成了“十日”。

第三，力空的身份，在《纪实》中前称“广胜住持和尚”后称“到兴唐寺任住持和尚”，但按《年谱》的记载，力空当时并未任这两寺住持和尚。请细阅《年谱》所载：

（四十六岁民国二十五年丙子）正月望日接恩师信，令回兴唐，遵即（自北平）南旋。时波罗上人住持广胜上寺。……我于四月初告别波罗和尚而上五台。……十月底，……返至广胜，波罗和尚强我供职。我以要掩关静修百天辞谢。于冬月望日彼送我入住关房。乃于后十天即示微疾，一言未发，至第五天安详端坐而寂。地方官绅护法居士闻知，再三强我出关主席。不得已，始于年节出关，暂维广胜现状。

观此段记载，力空似乎已任住持，但请看下文又有转折：

（四十七岁民国二十六年丁丑）正月十六日，集邑之士绅护法商讨另请高僧住持广胜，大众慰勉有加，嗣我提出聘请范成法师，众皆赞成。……秋后，日军至太原。……前者请范成法师来寺住持之信不见回音，始于冬月初三送波罗和尚之发徒本一上位，代理住持，为勉进坐禅诸师，请性海师担任维那。

至此知代理住持者为本一，非力空也。

（五十一岁民国三十年辛巳）七月杪，恩师妙公圆寂于

兴唐寺丈室。……遵谕由体源和尚代理传戒，并推举力宏师兄于戒期圆满后正式继承法席。

兴唐寺住持由力宏担任。

（五十三岁民国三十二年癸未）本一和尚倦勤，于四月初八日私自交付真云和尚。……（冬月以后）洪岩寺信谦师身患病症，不能劳作，着真法师前往代劳照管。

看来本一和尚也不愿担任住持了，因而他将这一职务私自交给了真云和尚，但没有交付力空。又，真法师不知是否就是真云和尚。倘若是，则真云和尚往洪岩寺一走，广胜寺的实际管事又要落到力空头上。但是，力空是否当了住持了呢？请再看下文：

（五十四岁民国三十三年甲申）七月二十七日，日军刺杀兴唐寺僧俗共十一人。事后，人多惊走，监院僧值等，请我去行维持，不得已，我偕往兴唐，居住半月。代寺众致信力宏和尚催他即日由省登程回寺。腊月初，力宏和尚由省归寺，三日给我写了四封信。并连派监院诸客等迎请我到兴唐，强要将住持职任交代于我。我以前者发有今生不当住持之誓愿，绝对不能违犯自己的愿心。最后，始允以如必欲我服劳者，你若出外不在时，逢到期头，我不妨来代你与诸位商量商量，幸蒙他谅解。

看来，力空到底没有接受兴唐住持之职。翌年，力空虽因力宏之邀到兴唐寺住了二十多天，“主持开给单钱并安职等事宜”，但也仅此而已，再过一年，即1946年春，力空便启程往西安了。从上引《年谱》内容考察，力空当时肯定没有担任广胜、兴唐二寺住持。不过，以他频繁地活动于二寺之间来看，他实际上左右了二寺的大政。事实上，如果没有力空这样一位在僧俗两界都具有很高威望而又精于佛典、深知《赵城金藏》价值的人物策划与努力，抢救工作将是十分困难的。

最后，从内容上看，《纪实》显然要比《年谱》具体、丰富

得多。这是扈石祥先生辛苦搜集了大量资料而获得的成果，无论在党史、地方史、文化史和宗教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不过，《年谱》的发现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它既可以使我们了解力空法师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发掘有关抢救《赵城金藏》的历史资料的线索，以期使这一历史事件更加准确、清晰，更加光彩。

《赵城金藏》在当时受到了我党的八路军、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地方军和日本侵略军四个方面的注目。日本人的活动是很猖獗的，他们公开索要和谋划强抢，这在《纪实》中写得很明确，《年谱》中也以一再记录日本人的骚扰活动作出反映，表明了力空深明民族大义的气节。而在我党的八路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军三者之间，力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能体现民族利益、也最有能力保护《赵城金藏》的八路军。

在《年谱》中，对中央军李默庵的活动一字未提，而在《纪实》中有翔实的叙述。李默庵是湖南长沙人，1904年出生，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1937年任国民军第十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山西忻口会战，任左翼兵团指挥官，忻口会战之后他率军南下，一度驻防晋南，遂有欲将《赵城金藏》转移重庆之议。但是，正如《纪实》所载，李默庵是碰了钉子离去的。

对阎锡山的地方军方面的活动，《纪实》所述较略，《年谱》似乎也未言及。但是，《年谱》四十七岁民国二十六年丁丑条中记载的“贾韬园乘检阅绥靖主任行营之便偕采运处处长蔺芳生来山游访”之事是值得注意的，它与《纪实》所云“1938年2月7日阎锡山又派人自临汾来到广胜寺”虽然时间不一致，但距1938年2月日军进占赵城仅仅几个月，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贾氏名景德，字煜如，韬园为其号，山西省沁水县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1904年甲辰科进士，1927年任国民军第三集团军秘书长，1928年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部秘书长，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

署秘书长，1937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1939年以后担任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并著有《韬园诗集》、《韬园文集》等。以贾韬园的文化层次与政治地位而言，决不会对《赵城金藏》置若罔闻，此次上霍山自然要言及此事，甚至就是为此而来的。据《年谱》记载，藺芳生是1933年与其兄弟及力空俗家儿辈一起将力空在家时的杂稿整理成《懋室心声集》的人，他与力空的私交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力空并未因私人交情而交出《赵城金藏》。其中的交涉情况，虽无从得知，但令力空为难之极是可以想见的。

力空向往进步的观念是非常鲜明的，他在自撰的《年谱》中毫不掩饰与八路军协力抢救《赵城金藏》的事实。然而，对于事实发生的过程却记载得很少，对于自己因此而受的磨难也毫无怨语。抢救《赵城金藏》无疑是会载入史册的一大功德，但是力空并未居功自恃，因而《年谱》所载内容显然比《纪实》简略得多。力空法师真乃谦谦君子也！

作者工作单位：书目文献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